

※研究動態※

四川大學建構「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意義與理想

吳銘能*

前 言

臺北《聯合報》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報導一則不起眼消息：「檔案局檔案整合平臺電腦網路上線。」引起我的特別關注。茲錄全文報導如下：

檔案局明天下午將在國家圖書館舉辦「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臺」啓用典禮，網站 (across.archives.gov.tw) 同時上線。檔管局副局長林聰明表示，查詢平臺整合了二十九個資料庫，分別屬於文建會、國史館、國家圖書館、臺灣大學、中研院和兩個地方政府資料庫。

二十九個資料庫中，比較引人注目的，包括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物和陳誠副總統文物檔案。日據和光復初期時代的檔案包括臺灣文獻館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總督府檔案和公賣局的前身「總督府專賣局」檔案等。

把圖書資源在網上公開，提供學者方便使用，對於多數人來說，可能覺得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對於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大陸現狀而言，卻是一件很難堪而慚愧的對比！這話怎麼說呢？還是要先從使用圖書館說起。

眾所皆知，大陸圖書館的圖書資源很多，但服務的質量卻很差。作為一個臺灣人，最難以接受的，就是看善本古籍要收取高昂的調閱費用，影印一張也得好幾元、甚至一、二十元人民幣，這是很多人共同的不愉快經驗。我從二〇〇五年秋天服務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轉眼間，已經邁入第五年光陰了，圖書研究資料取

* 吳銘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兼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

得不易與管理不善導致的效率低落，是我一直難以釋懷的心頭大事！與其不斷到圖書館，不斷有抱怨在心裏，倒不如想出解決對策，才是積極的作為。四川大學即將建構「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就是嘗試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中國的學術也就沒有前途，此一淺顯易懂的道理，不必解釋就很清楚了。

西南文獻中心構想的緣起

有了這樣的想法，但沒有人支持，還是如畫餅充饑，只有一陣空想而已。正好在二〇〇九年四月八日校領導羅中樞、安小予等十餘人到歷史文化學院調研，就「實踐科學發展觀」提出如何落實，並聽取教職工建言。我被指定參加了這次的會議，提出建立「西南文獻中心」的構想，以因應川大未來發展戰略的需要，羅書記當場指示將此構想寫成書面意見，交予校領導批示裁奪。

這件事我本以為是例行官樣文章，寫過之後，就不再抱定任何的希望，沒想到六月底接到開會通知，七月三日學校以盛大規格安排了這場說明會，到場者有圖書館、檔案館、社科處、國際交流處、財務處、人事處、儀器設備處等單位，還有學院的院長與書記，由趙昌文副校長與羅中樞書記共同主持討論。初步裁示先擬定專題，再研議可行性方案。於是在暑假做了充分準備，自七月二十七日起，帶領研究生，展開一個月的四川省內檔案局的調研工作。

九月十七日，我向校領導彙報調研情形，並聽取各專家的意見。校領導就「西南文獻中心」的名稱、必要性、定位與功能、實施步驟、條件保障、如何完成目標，以及經費來源等，提出徵詢討論，形成決議。十月十日，校長辦公室正式發文「關於四川大學中國西南文獻中心籌備有關事宜的會議紀要」，同意按校批研究機構組建「四川大學中國西南文獻中心」，第一階段主要工作為抗戰時期地方檔案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建議納入九八五工程及二一一建設平臺，並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和保障，同時也應積極爭取地方政府及檔案管理部門的支持，形成較穩定的資金來源。

西南文獻的豐富寶庫舉隅

以上是我提出建構「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動機始末與設立經過。

有人或者要問：「到底西南地區有什麼重要的文獻資料？」舉例來說，近幾年貴州大學發現了貴州省以錦屏縣為中心的清水江中下游地區苗、侗族人，長期從事林業生產的各種歷史紀錄，叫作「錦屏文書」，又叫作「清水江文書」，具體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包含有山林、田地、房屋、水塘、菜園權屬買賣契約文書及傳承紀錄，也有合夥造林、佃山造林、山林管護、山林經營契約，以及山林土地權屬糾紛訴訟、調解裁決文書、土地買賣、家庭收支登記簿冊、村規民約、家乘族譜、古籍等；時代起於明朝末年，一直延續到清朝，保守估計總數達三十餘萬件，其中錦屏縣就保存有十餘萬件。這些真實反映當地及周邊區域社會生活和歷史面貌的珍貴歷史紀錄，數量龐大，是研究苗、侗地區民族、經濟、文化方面最真實的第一手實物史料。

作為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四川、雲南、貴州與廣西等省地處內陸，交通不便，鮮少有人特別去關注這些地方，但也因此意外地成為歷史研究資源極少受到人為地破壞。以下我想舉幾個集中四川地區的例子，說明西南文獻的豐富性質。雲南、貴州與廣西等省範圍更大，時間與精力在短期內完成調查均不許可，但讀者從上述貴州「清水江文書」的簡介，以及筆者實地走訪四川檔案局的調查例子，舉一反三，當可知其研究資料豐富而多元，實在是值得開發的「礦源」。

如有都江堰疏濬的公文，可以看出清代地方政府利用每年九月水勢較小，就興工截開外江，使之斷流，然後由夫役一律淘挖疏濬，次第編裝竹籠，以待來年春天水勢暢流，農業用水就可以充沛不虞匱乏。從光緒二十一年到宣統二年，年年告示周知，下達縣屬十里各堰一體遵照，嚴格執行，「倘敢逾限，抗延不修，或修未妥善完竣，貽誤春耕，一經查明，或被具稟，定行喚案，嚴究不貸」（公文原件用語），這些公文珍貴而完整地記錄一百多年前四川省水利工程如何受到保護的過程，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很值得提出專題研究。其餘民間官司案件訴訟、地方禁絕賭博吸食鴉片的告示、地方書生上稟褒揚貞烈婦女文件、清廷鎮壓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告示、晚清新式學堂資料、廟會祭典清單等，都是很有價值的線索，以這些線索連貫巴縣與南部縣檔案的相關卷宗，再配合晚清的報刊雜誌等，四川民間社會的圖像應不難有清晰地呈現。

又有抗戰時期徵募壯丁花名冊、逃亡壯丁花名冊、戰時國民兵役訓練方案、估拉壯丁與民間陳情卷宗、出征軍人婚姻保障法、陣亡家屬請領撫恤優待的紀錄清冊、嚴禁估拉壯丁的訓令、被抓壯丁家信等，這些檔案資料如能夠經過系統而縝密

地統計分析，對於抗日戰爭時期地方基層如何徵集兵員的運作過程與諸多民怨如何處理，以及四川地區徵調多少人數投入八年抗戰、傷亡人數若干，完全可以清楚揭示。其中還有以無期徒刑與判死刑犯人充作「抗日戰爭敢死隊花名冊」，囚犯高達二千三百多名，年齡、籍貫、因何犯罪等記載，厚厚一冊非常完整，這是首次僅見的。

透過這些檔案，也能強有力地解釋國軍在對日抗戰時期的軍隊素質，其實是良莠不齊的，因為強拉民夫充當壯丁者居多，而且逃兵花名冊的人數極多，另外保長借徵兵之名而行勒索之實的告發信函到縣長辦公室的也很多，這些都是研究抗戰史的學者所不知道的。

還有抗戰時期書刊查禁一覽表，每半個月的訓令通告各縣市，顯示毛澤東、陳伯達、王明等人的著作在抗戰時期還是受到嚴格查禁。因此，可以這麼說，即使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取消剿匪、國共兩黨一致共同抗日協議，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但由檔案顯示，在具體落實方面，蔣介石為了國家的利益，仍不放鬆對共黨的防範，這是研究「西安事變」的專家必須理解的觀點。

近兩年中、日兩國有共識要一起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八年中日戰史是核心要點，但四川地區有關對日抗戰時期基層縣市如何投入這場長達八年戰爭的檔案，是如此豐富與完整，北京與日本的學者竟然沒有注意到，這說明我的調研對於史料價值是有重大突破性發現的。

又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解放軍何時入四川地方縣城，接收並「要求」列隊歡迎的公文通告，其史料價值是很顯然的。可惜該局保護不善，已近乎腐朽的嚴重程度，為了保護這些珍貴檔案，避免拍攝壓折而加速損毀，我們基於文獻保護的立場，毅然放棄了同意拍攝的機會。

兩大意義

這些文獻都沒有人好好系統整理，過去都是歷史系博士班與碩士班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才偶爾去注意發掘的。如此一來，缺點當然很多：一、零星毫無系統可言，就像是打游擊戰術，東拉一點，西湊一些，稀稀落落，沒有一個宏遠規模。二、僅僅為短暫的研究，畢業論文答辯之後，資料就隨人走而消去，沒有積累的成

果可見。三、缺乏穩定的經費從事集體研究力量，所得成果大多沒有條件發表，外界也就不甚了了。

此刻提出「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作用，就是有這麼一個專屬的研究機構作為平臺，透過組織的力量，全力專注貢獻於西南地區資料系統清理與專題深入研究，並表現出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回應經濟起飛後面臨的挑戰：孟子所謂「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中國大陸經濟已經達到一個解決溫飽的階段了，經濟起飛之後，文教建設是一個最重要的接續工作。「富而好禮」的社會，應該是人人所嚮往的，從事建構文獻資料的工作，就像打好地基一樣，根深才會葉茂，將來綠樹才有機會成蔭。二、展現西部崛起的旺盛企圖心：文教是永續發展的奠基事業，整個大西部的開發算是改革開放比較晚的地區，將來西部發展也會如東南沿海地區一樣繁榮，正如中國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二〇一〇年三月所強調的，今後十年是西部大開發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應該以發展教育為優先考量。所以「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提出，乃箭在弦上，正逢其時，不得不然的結果。

我提出的這個研究中心，除了有調查、整理文獻、結合專業研究的功能之外，當然不容諱言地，終極目標是要實踐以下四項理想。

四項理想

一、打破大陸高校與圖書館壟斷學術資源的粗暴行為

十四年前（199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圖書館，永遠忘不了那一幕情景：借書填調閱單，先是收了我兩毛錢的調閱單填寫費用，然後等了四十分鐘之後，館員告訴我要看的五種書有三種沒有，如要看的話，要先交錢才能看。十四年後的今天，仍然要索取不合理的高額費用。

全世界的圖書館，沒有那個先進國家像大陸如此粗暴沒文化，看書要收費。我帶領研究生到四川省境內檔案局調研，綿竹縣檔案局連看微縮膠片都要索取調閱費，有的更誇張，南充市南部縣檔案局複製一頁資料，竟索價高達二十元人民幣，簡直是敲詐，令人氣憤。五年前，友人北大教授漆永祥兄到蘇州圖書館古籍部看善本，受了一身氣，不甘斯文掃地，只好在報上發難，表示抗議，但是時至今日，似乎沒有任何的改善，依然是老大作風，如同衙門通關，處處伸手要錢。謂吾不信，到各大圖書館轉一圈就知道了。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在各大機構到處掛

著，但如果實地到各圖書館借閱資料，就會發現疏漏了一個字，應該是「為人民幣服務」。

四川大學「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要打破大陸圖書館壟斷學術資源的粗暴行為，掃除當今圖書館處處要錢「衙門作風」的陋規，反對把作為學術公器的資料當作牟利斂財的工具，只要讀者前來查閱資料，一律免費接待，恢復過去泱泱大國禮儀之邦風範！

二、建立學術尊嚴的始點

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吳小如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過去清華學堂的研究生只要在圖書館填個書單，交到櫃檯，第二天就會發現館員已經把書籍裝在籃子內，齊整放在宿舍門口，服務是非常到位而溫馨的。於是，他很感慨現在的圖書館不但過去那種尊重讀書人的傳統沒有了，借書還得看館員擺著晚娘的臉色，令人覺得很不是滋味。

最近有學者提出早期資料的整理與搶救，主張系統地、大量地收集包括完整記錄和統計數據的地方檔案與民間文獻¹，這是很有見識的看法。但似乎沒有提到怎樣解決上述壟斷學術資源的辦法，唯有資料能合理免費地公開，學者才有尊嚴可言。「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建構從無到有，不能繼續沿襲目前的陋規遺習，應該避免「重蹈覆轍」，就是要讓學者安心而方便地大量使用這些資料，從事研究，不必遭遇到不合理的刁難。

三、闡發國際接軌的精義

大陸這幾年大談與國際接軌，可是一究其實，談了半天，全都不得要領，大有邯鄲學步，反而失卻了自家本我特點，十分可惜。例如當今的選美活動，一定要女人穿三點式，翹屁股、大乳房、瘦腰長腿，身材比例完全是西方標準的那一套，殊不知世界各個民族的特點不同，體格的樣態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以過去中國唐朝的審美標準看來，美女的體格應該略呈福態微胖，髮髻盤起，橫插小梳子，臉上化妝，貼花的樣式很多，服裝雍容華貴，充滿了大膽創新，像杜甫詩所說的「濃態意

¹ 見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一文，發表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43-160。

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表現東方女性婉約氣質的特色，與西方人選美追求外在肉慾刺激完全大異其趣。

選美如此不堪，有如上述，而圖書館如果要說與國際接軌，國外圖書館安適寧靜的環境、館員親切認真的服務態度、資料全面免費使用、二十四小時開放閱讀的制度等，大陸有哪一個大學圖書館能辦得到呢？要談國際接軌，「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建立，即使在二十四小時開放制度短期內達不到，但至少前三項的要求（安適寧靜的環境、館員親切認真的服務態度、資料全面免費開放使用）是要徹底做到的，這樣才不致太丟臉。

四、發展區域研究特色的學術重鎮

由於歷史的因素，全中國著名高校有一半以上雲集於北京，擁有得天獨厚的豐富學術資源優勢，因此學術議題能夠與世界有更廣泛地交流與對話。地理因素與發展格局所致，上海作為中國商業金融的中心，除了北京之外，應該是中國第二大學術資料重鎮。四川作為邊陲地區，沒有足夠的資金與流通的學術網絡（指與北京、上海相對比較而言），唯有發展自家的特色，才有條件成為與北京、上海鼎足而立的研究大本營，「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要能夠充分收集具有地方文獻特色的資料，進一步開發新議題，引領風騷，徹底打破北京與上海壟斷絕大多數學術資源的獨占局面，呈現學術多元發展的新風貌。

目前面臨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這兩大意義與四項理想，其規模是如此宏遠，格局又這樣大氣磅礴，到底能不能如願完成呢？無容諱言地，目前「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甫建立即面臨了四大困境，有待解決。

一、有將無兵

「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目前只有兩位規劃的正、副主任，而且還是由專職的教師兼任。這兩位教師除了要上課之外，還要指導研究生，工作辛勞可想而知！當前只聘任一位正式編制的助理，其餘的研究人員付諸闕如。如果想要有所作為，以眼前的微薄人力資源，是遠遠不敷所需的。

二、糧草短缺

校方既然已經發了文件同意設立「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而且已有了一間六十平方米的空間作為辦公室，設備如辦公桌、電腦、印表機、掃描機、數位相機都有了，堂堂四川大學擁有百年名校的輝煌傳統，「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是為了學校文科建設另闢資料來源，每年花一百萬元人民幣都不算多，可是學校的主事者有否這樣的眼光與魄力呢？

三、觀念陳舊與本位主義作風

現今學者有不少人還有「不為他人作嫁衣裳」的陳腐觀念，以為這些文獻建構的工作曠日持久，不易立即看到成效，因此大多望而卻步，不願意投注時間與精力從事。這種急切想看到成績的陳腐觀念，主要係受到當今不合理的評鑑制度，產生了習焉不察的錯誤觀念所致（詳下段）。

另外，許多大城市經濟條件較佳，圖書館建設相對地也有良好的硬體設施，有種本位主義的老大作風，以為「只有我館才有能力保護這些資料」，因此挾著雄厚財力，把地方上的歷史文獻搬入收藏。這種做法美其名是保護文獻，實際上影響至少有兩方面是不好的：（一）近似掠奪式榨取地方文獻的粗暴行為，很不利於地方平衡發展。（二）不尊重當地的文獻收藏單位或個人，把地方文獻轉移到外地大城市收藏，已經泯滅了在地文化特色的傳統。

「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期待有個真正清新而健康的學術資源環境，充分尊重在地文化資源，堅持「在地文獻留在當地」的原則，絕不從事掠奪式榨取地方文獻的勾當，以平衡發展地方建設，尊重當地文化傳統。

四、急功近利思想作祟

上段所述，在當前大學的評鑑體制下，每年要拿出成果表現，一律以數量多寡為準，也規定列名在所謂「核心期刊」之內。於是就造成了一大笑話，香港高校與臺灣中研院的刊物沒有列入所謂的「核心期刊」之內，但能夠說在港、臺的刊物發表文章，就未達到水準嗎？學術作為天下的公器，不是關起門來自己說了算數，應該是放在世界的舞臺上評判。何況，很多大陸內地的刊物多沒有評審制度，一篇文章寄送之後，說是「三個月內沒有通知，請自行處理」，從不像港、臺的刊物，不

管有沒有錄用，還給了密密麻麻的評審意見書。由此可見，這種「核心期刊」的認定，沒有一個公信的制度，真是荒謬絕倫！

這種制度建立乃為了職位升遷有個遵循依據，不致浮濫倖進，也鼓勵多多研究發表，欲以形成樸實學風，立意初衷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社會學科的屬性各有不同特性，不能一概純粹以量化評量。

過去，沒有這些評獎與科研基金種種名目，學者的成果乃真積力久，自然而然所致，而如今人文學界浮躁與抄襲風氣愈演愈烈，不得不令人反省：這樣的制度講求短期急效，忽視了人文環境氛圍需要長期耕耘才能形成，對於踏實「慢工出細活」的學者，是很不利的傷害，到底是否有益於學術健康發展？

以中研院史語所為例，傅斯年與徐中舒主持的整理明、清檔案，已故黃彰健院士的《明實錄》校勘，在胡適院長的支持下，花了整整三十年的光陰，而刊行完畢，又得歷時多年方克竟成²。現在的條件當然無法像上一輩學人如此耐煩工作，但謹審認真的精神總是應該取法的。

解決之道

問題的發現總要尋找解決的方針。上述問題如何解決，也許以下三點可以作為參考。

一、爭取海外基金會或企業界贊助經費

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向熱心獎掖學術的海外基金會或企業募款，以紓解目前的困境，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以美國一流著名大學的科研基金與提供外國留學生獎學金為例，絕大多數是來自校友的慷慨捐助款項，因此他們的學術研究，相對而言，就顯得比較獨立自主，不必依靠官方的挹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資金來源也應該是從海外熱心贊助學術基金會或著名企業而來，這是走向取之於社會、貢獻於社會的第一步，也是突破目前啟動資金不足的契機。

² 吳銘能：〈黃彰健先生的校勘之學與史學精神〉，收入朱泂源主編：《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頁65-100。

二、透過國際交流合作與召開學術會議

學術不能閉門造車，應該以開闊的胸襟，與國際間展開合作交流。透過不同學科的交流合作，國外學者的豐富經驗與眼光，一定可以群策群力把「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資料建設平臺搭建起來，而透過學術會議的召開，更能把西南區域研究推向世界的舞臺，成為國際上一流的學術資料與研究中心。

三、招募世界一流人才加盟

只要是認同我中心「建構資料、研究學術、引領風騷、服務社會」宗旨的海內外學有專精的學者，都是我們的盟友，竭誠歡迎他們能夠共襄盛舉，加入我們的行列，為後代學術資料千秋大業而一起打拼奮鬥！

結 論

萬事起頭難，所謂「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只要確立「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的建構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以大無畏的毅力精神，一定可以辦到成功的。本中心承蒙龔鵬程教授惠書「名山大業」題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先生的多方鼓勵，以及各地社會賢達支持與協助，謹在此表達萬分謝忱！